

中国南方古代民族

ZHONGGUO NANFANG GUDAI MINZU

杨帆◎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南方古代民族

Z H O N G G U O N A N F A N G G U D A I M I N Z U

杨 帆◎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南方古代民族 / 杨帆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 - 7 - 222 - 11355 - 8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古代民族—民族历史—研究—云南省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5636 号

出品人 刘大伟
责任编辑 张波 王韬
责任校对 王以富 杨雅然
装帧设计 杨晓东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中国南方古代民族
作 者	杨 帆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4. 2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出版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11355 - 8
定 价	40. 00 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 - 64164626

印制科电话: 0871 - 64191534

自序

本书虽定名为《中国南方古代民族》，然是立足于云南的考古材料和史料，继而面向华南及东南沿海、东南亚拓展的对比研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一扇扇历史之窗隐约地露出了轮廓，于是好奇向整个中国古代的南方地区延伸。

在云南搞考古工作，在那些古代器物的背后，我们都要考虑一个族属问题，因为现今的云南和有史可查的云南都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考古不仅要解决一个考古学文化的问题，我以为更有意义的是要关注创造这一文化的“人”。

在2000~2003年整理编写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报告时，很多疑问不断困扰着我。以前研究者们很肯定地说滇的主体民族是越人，可滇文化中丝毫没有东南沿海越文化的影子。我也读过蒙文通的《百越民族考》，在书中蒙先生指出“百越非止一族之义”。那么是什么原因称为“百越”呢？很快我发现百越在史料中不是一个族属的概念，而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泛指分布于九服制以外的众多地区，如古籍中有称西域地区为“沙越”，而“骠越”其骠人为藏缅语族的分支，显然也不是“越人”。不少史料如《汉书》、《华阳国志》已很清楚地记有“越，方外之地”，“固九服之外也”，这是一个地域概念。那么真正的越人是什么呢？古之少昊氏显然和太昊氏有某种内在联系，而古代的越人分布区，恰好是今天所有南支汉语方言的分布区。另外很早就已迁走的南岛语族，其语言成分有“闽粤语”（南支汉语）的底层因素，显然闽粤语的形成不会是在秦汉或更后的汉人迁入时才有的。恍然大悟——古越人其实不是什么少数民族，而是南支汉人。现今将古越人与今天壮、傣等民族联系也很勉强，“三苗”是从长江中游直至下游一字排开的格局，下游是越，中间是苗瑶，那么中游的浑沌之后该是谁呢？自然就是百濮了。

正是人们对“越”和“百越”的错误理解，以及对“三苗”概念认识的

含糊不清，导致了今天南方古代民族研究的混乱。在长江以南地区，凡发现青铜时代的新器物或新的考古学文化，都统统归在了“百越”的名下，抗击北方入侵急先锋的蚩尤之后或浑沌之后全没了踪迹。

“三苗”这三大族群早在传说时代就已经形成，这是中国古代南方民族的三个最根本的渊源。古时如此，今天亦如此。古有穷奇、浑沌、饕餮，有越、百濮、苗蛮，今天中国南方民族从语言上看有汉藏语系的南方地方汉语方言、壮侗（或壮傣）语族以及苗瑶语族。湖南分布的维吾尔族、白族，云南分布的蒙古族以及整个南方地区分布的回族等都是元朝才进入的民族，这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那么，“三苗”这三大族群在历史上就该有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的存在。然而，现今考古学界忽视了创造这些文化背后的族群间的相互关系。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似处也以“相互影响”、“有联系”等语焉不详之词一笔带过。如几何印纹陶文化分布区，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再如都使用铜鼓的青铜文化，又被命名为夜郎文化、滇文化、句町文化、雒越文化、东山文化、哀牢文化等等，都以某某文化受某某文化影响，或相互间有联系来解释文化间的共性，而没有去关注创造这些文化背后的族群是何关系。事实上，考古学文化间的共性，很多是因为考古学文化背后有着共同的族群。而文化间的部分差异，则是同一族群间的分支及分布地域不同或时间上的差异而表现出的不同。

考古学离不开史料的辅助，也离不开神话传说的引导和分析。于是我大量查找史料，并进行考古资料的对比工作，问题越来越多，而兴趣也越来越浓。我注意到史料中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地名或人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常有相似译音的多个汉译字。云南初设郡县时，众多的地名显然不是汉人来一一定名的，而是根据少数民族的发音，用汉字来记音。如“滇”，不是因为滇池水形如倒流而称为“滇”，而是氐羌系统（藏缅语族）民族对山间盆地称呼的汉字记音，汉文史籍中还有“埡”、“底”、“甸”、“的”、“氐”等不同的汉译字。“云南”也一样，并非后人理解的“彩云之南”的汉意词，而是少数民族发音的汉译词，是百濮民族（壮傣语族）对某个地方称呼的汉译词。还有“那”、“弄”、“郎”、“牢”、“老”等汉译字，如“西双版纳”，没有任何汉字意，均为汉字记音。

纵观铜鼓的分布，它是呈扇形从长江中游一线向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分布开来。在这一铜鼓分布区域内，无论器物或装饰纹饰，都有许多文化上的

共性，然各文化之间也有些差异，毕竟它们迁徙后分布于不同的地方并与其他文化有过融合或交流，我理解为他们都是百濮文化的各个类型。

氐羌民族进入云南的时间也较早，大约在夏、商时就已开始。有考古材料显示，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东缘以及沿着几大江河走向，可能都是沟通南北文化的通道。氐羌的进入一直绵延不断，在战国、秦汉甚至于魏晋时都有；也造成了今天云南藏缅语族支系众多的现象。

本书研究的范围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今，中国南方古代民族的形成、迁移和今天的分布状况。再早的材料超出了我研究的范围和方向。需要说明的是，人类的起源和族群的形成从来都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现代人起源于非洲说是国际主流观点，认为现代人于10万~20万年前走出非洲，并于6万年前到达东亚。中国南方及东南亚更早的文化可能是“三苗”形成的早期基础。有新的研究和观点认为2万~3万年前现代人及物种的演化是一个由南向北推进的趋势。云南石林白石头岭、呈贡龙潭山、富源大河等旧石器遗址所发现的石制品都与欧洲莫斯特文化有相似性。这些观点和认识，无不说明人类的形成和族群的形成都处于一个时常迁移的过程，无论是南北方向还是东西方向，都是如此。

要改变影响已深的传统认识很难，我自身学识有限，对一些问题的研究也深入不下去，权当一家之言，孰是孰非，后人自有评说。

杨 帆

2013年3月



目录

自序 杨帆 / 1

上篇 古代民族系统

论“三苗”及其迁徙 / 3

混淆的“百越”概念 / 20

“百濮”考 / 37

复原“苗蛮” / 96

氐与羌的区别 / 119

南岛语族起源的几点认识 / 134

孟高棉语族与身毒人 / 145

下篇 古代族属

关于“云南”和“滇” / 153

嵩、昆明、鼈牛种及邛、笮 / 160

关于僰人 / 163

哀牢初探 / 167

句町及漏卧初探 / 185

叟人非塞人而是氐人 / 205

滇、夜郎、句町、漏卧、哀牢的王侯称谓来源问题 / 209

云南的火葬墓 / 211

后记 / 220

上篇 古代民族系统

论“三苗”及其迁徙

“三苗”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三苗”作为上古时代的区域主角，虽有不少传说载之史籍，然大多语焉不详，且多为文字发明后人们的记录，其中能反映多少历史的真实，还需认真地辨别。而用考古的手段去解决这一问题亦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大量考古材料的出现及考古材料分析理论的提高。并且族群的迁徙、文化面貌的变异和融合以及时代的变更，都使考古的方法有了局限。

史料记载的“三苗”为帝鸿氏、少皞氏、颛顼氏的不才子浑沌、穷奇、檮杌。另有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亦比之“三凶”。最早这样记录的是《左传·文公十八年》，《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与之无异。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史料中的“三苗”是三个不同来源的族属，各有事迹，然今人多将“三苗”视为长江中游一特定区域内的南蛮系统，而这一特定区域的划定，唯一的依据便是《战国策·魏策一》记吴起说：“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这一说法的可靠性有多大？无人怀疑，后人将该说作为定论，限定了“三苗”的活动区域。这是一种狭义的“三苗”观点。

宏观地看待这一问题，长江中游、下游的两大文化中心在新石器晚期的突然衰落及中原文化的迅速统一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亦有诸如“迁三苗于三危”这样的提示，那么除了被征服地区的原住民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变异可以进行深入研究外，另一部分被打散的“三苗”迁徙何处？《山海经·海外南经》之“三苗国”是否是南逃之“三苗”人所建？同时期西南腹地的较为落后的诸种原住文化是否也受到了这一大的历史背景的影响？南岛语族的起源



和“三苗”的南迁有无关系？近年来西南地区及东南亚新考古材料所透露的一些蛛丝马迹般的信息该如何认识？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文明前夜长江中下游地区所遭受的严酷打击这一巨大历史背景不能说毫无瓜葛。

一、考古现象与历史背景

很多研究者注意到龙山晚期长江中游及长江下游地区曾经辉煌的两大文化中心突然衰落的考古现象。“然而，盘亘了数千年的土著原始文化到此时却急转直下，突然又衰落下去。其表现在，相当于龙山晚期的遗址明显减少，寥寥无几，并且遗址面积小，堆积也不厚。再者，从屈家岭文化时期发展起来的古城，到此时几乎是同时废弃。更为明显的是，原来土著文化体系到此时发生了大变化，这一变化的程度又因地区不同而异，目前大体能看出变化轨迹的可分为四个地区”^①。长江中游的这四个地区概言之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河南龙山文化的影响。

“众所周知，长江流域从文明因素的孕育、起源和发展，直至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开始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发生的过程。在这一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长江流域古文化和黄河流域古文化曾有过接触，并有过互相影响。两者有时互为强弱，有时又旗鼓相当，基本上不存在主与从、高与低的问题。它们在长期交往中都从对方吸收了一些有益的因素，以利自己的发展，但这些外来因素又都没有能够改变自己的文化特质和发展方向。因此，按照正常途径发展下去，长江流域在自己创造和积累的文明因素基础上，也会像黄河流域在继中原龙山文化后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正式进入文明一样，在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之后正式建造起自己的文明大厦。但是由于夏文化的向南扩张，打乱了长江中游一带正常的发展秩序，使该地区最终失去了独立进入文明的机会。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时期也积累了较其他地方更多的文明因素，可惜，后续的马桥文化虽然出现了具有文明特色的铜器和原始瓷等新技术产品，但还不能提供在良渚文化之后进入发达社会和高生活质量方式的证据，上述良渚时期产生的所有新事物，几乎全面回落，原本具有发达文化的长江下游却耐人寻味地与中国第一王朝的诞生地

^① 高崇文：《试论长江中游原始文化的变迁与古史传说》，严文明、安田喜宪主编《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擦肩而过了。”^①

无疑，北方夏文化的掠夺和扩张是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突变和衰落的主要原因。该文还从气候环境的变迁角度对良渚文化的衰亡做了解释，认为气候恶劣使良渚文化迅速衰亡，遗址数量骤减，空间分布呈散点状。良渚时期产生的所有新事物，几乎全面回落。^②

类似观点的研究文章还有许多，归纳之，即夏朝的建立是在消灭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众多敌对势力和掠夺这些地区的大量财富的基础上实现的。

古史传说中这类事迹亦有众多线索。如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等等。在征服了这些敌对势力后，采取将敌对势力拆散迁出和将亲信迁入的做法以巩固其成果和消除隐患。迁出者如《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讎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其后的中国历史上亦多掠夺者，除对财物的争抢外，还将被征服地的工匠大量强迫迁走，如金对宋、南诏对成都的洗掠，都将被征服地的技术工人大量胁迫而去。所谓“迁三苗于三危”，也存在这种可能。迁入者如《越绝书》载：“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

禹在治水的“仁德”掩盖下，对未臣服者继续进行征伐。《墨子·兼爱》引《夏书》云：“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封）诸群（君），以征有苗。’”《太平御览》引《随巢子》佚文：“昔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夏后受于玄宫……四方归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违，辟土以王。”舜、禹两帝很可能是征伐三苗而战死，《史记》委婉地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句下郑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中国历史上有关君王因征伐而战死他乡却以“巡狩”来掩盖的事例并不少见。

中国上古诸侯间的兼并战争使文明开始了交流和融合。大规模的征服战争有三个波次。第一波次的战争都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展开，如炎帝与黄帝的

① 高蒙河：《长江下游考古地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18页。

② 高蒙河：《长江下游考古地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9页。



战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史记·五帝本纪》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需注意的是此时的炎帝也好，蚩尤也好，能与黄帝在中原腹地作战，说明他们的原居住地亦在中原或中原附近。第一波次的战争失利后，炎帝部、蚩尤部退出了中原地区，撤至长江中游一线。

第二波次的战争集中在长江中游至长江下游一线。《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蛮：四罪而天下咸服”。这样的大规模迁徙，不施以武力光靠说服教育显然是不行的。《史记》外的其他史料言明了这一点。

第三波次的征伐，《史记·五帝本纪》有“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区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桀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魑魅”。

正史对五帝的德行十分推崇，而对于被征服者总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舜因为征南而死在江南，所谓“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而禹因为同样的原因也死在江南。“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故守禹冢人的封地被称为“越”，“越”字从甲骨文结构来看，从走从戊，意为经长途跋涉，用武力征服的地方。

二、“三苗”渊源

《史记·五帝本纪》载：“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区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语言，天下谓之桀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这四个族群是夏的敌人，需征服和控制，于是“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魑魅”。

帝鸿氏是为黄帝，浑沌为其后人。颛顼氏为黄帝孙，有不才子桀杌。这

两支均为黄帝之后裔，成为夏族的叛逆后遭舜镇压。在考古学文化的表现上，这两个族群应源于夏文化而又有差异，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两个类型。高诱注《淮南子·修务训》：“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谓之三苗。”注意，该注已将颛顼氏之不才子梼杌排除出三苗，大概将梼杌之事迹与浑沌合二为一了。

少皞氏有不才子谓之穷奇。穷奇为兽名，亦为神名。《山海经·西山经·西次四经》曰：“邽山。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蝟毛，名曰穷奇。音如嗥狗，是食人。”《海内北经》曰：“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首始。所食被发，在蜺犬北。一曰从足”。故袁珂认为“上二说皆穷奇兽之状，盖均据不同图象而立说。其形虽异，食人则一”^①。穷奇部族是有“食人”之俗。少皞即少昊，是为五天帝之一的白帝。袁珂在《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少昊”条目中所记颇为有趣：“晋王嘉《拾遗记》卷一：‘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处璇宫而夜织，或乘桴木而昼游，经历穷桑沧茫之浦。时有神童，容貌绝俗，称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际，与皇娥嬉戏，奏娉媚之乐，游漾忘归。穷桑者，西海之滨，有孤桑之树，直上千寻，叶红椹紫，万岁一实，食之后天而老。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为表，结薰茅为旌，刻玉为鸂，置于表端，言鸂知四时之候，故《春秋传》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风，此之遗象也。帝子与皇娥并坐，抚桐峰梓瑟。……皇娥依瑟而清歌……白帝子答歌。……及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氏，亦曰桑丘氏。’‘少昊以主西方，一号金天氏，亦曰金穷氏。’此少昊生于穷桑，其地盖在西方。而《尸子》云：‘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此穷桑为少昊之都，其地乃在东方。《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于此曾建立其鸟之王国。而其神职又传在西方。《西次三经》云：‘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实惟员神魄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郭璞注：‘日西入则反景东照，主司察之。’郝懿行云：‘是神，员神，盖即少昊也。’曾为百鸟王之少昊，乃降而为‘司反景’之山神。其最后神职，则在与蓐收共司‘西方之极’万二千里地，又为西方之天帝。少昊所处地或东或西，其神职或升或降，于此见神话传说之纷歧无定。”^②袁珂这一感慨，

① 袁珂编著：《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穷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214页。

② 袁珂编著：《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少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78页。



其实恰反映了“迁三苗于三危”这一事件的真实。近年不少学者认识到“三危”之地在成都平原西部，亦认识到三星堆出土玉器与良渚文化的诸多联系。只是这一“三苗”乃“三苗”中的一支，即少皞氏的不才子穷奇。有食人（猎头）习俗，习于水（乘桴木而昼游，泛于海上），以桂枝为表，结薰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的百鸟王国为何？良渚文化也。留在原地未被迁走的那部分良渚人，在随后的岁月中向南向西拓展，与九黎融合，发展成为越人。

从考古学材料来看，少皞之良渚文化与东夷之大汶口文化有着某种联系，良渚文化最初被归入山东龙山文化系统。吴汝祚《论良渚文化与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关系》^①认为：就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相互影响的关系而言，虽不能排斥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对良渚文化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说，“良渚文化一、二期对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的影响是主要的”。

炎帝又称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子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等书都说，祝融是从属于炎帝的神。炎、黄阪泉之战，炎帝兵败，炎帝之裔蚩尤起而为炎帝复仇，后尚有夸父、刑天、共工等炎帝裔或炎帝臣继起奋争。而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很可能就是蚩尤。

蚩尤、饕餮同为炎帝裔，史籍记蚩尤的“贪虐”、“暴”与饕餮相同。故袁珂引宋罗泌《路史·蚩尤传》注云：“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其像率为兽形，傅以肉翅。”揆其所说，殆亦饕餮。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而《述异记》说蚩尤亦“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三苗之髻首俗？）头有角”，《神异经》谓饕餮亦“头上戴豕”。故炎帝部以农业为主要活动，而黄帝部，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当为游牧兼营不定居农业。《尚书·吕刑》中说：“若古有训，蚩尤唯始作乱。……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故何新在《诸神的起源》^②一书中认为蚩尤是北上的南方民族——苗黎蛮人——的首领，蚩尤曾称臣于炎帝，并与之联合，击败过黄帝部。蚩尤曾在炎帝的朝廷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但由于蚩

① 吴汝祚：《论良渚文化与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关系》，《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② 何新：《诸神的起源》，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

尤势力不断扩大，最后终于发动叛乱，以致驱逐了炎帝，迫使他向北逃避到河北涿鹿一带。《逸周书·尝麦解》记录了这一过程：“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帝。分正上卿，名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如是炎帝裔（或臣）的蚩尤，实同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为一人，即南方苗蛮人的首领，亦即后代苗瑶族群的祖先。由于蚩尤部的数次作乱，以致黄帝部多次对其进行打击，其憎恶程度也比之其他“三凶”为过，如对蚩尤、饕餮的史料描述，憎恨丑化到极点。故此这一部在随后的岁月中，多为避祸逃进了华南地区的丘陵山地。

这一部后来还有丹朱、讎朱（讎头）这样的首领。《吕氏春秋·召类》曰：“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云：“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故袁珂认为：“盖丹朱被放于丹水时，即与有苗联合共同反尧。‘服南蛮者’，实为服丹朱之故。”^① 这一支“三苗”，史书上常称之为“南蛮”、“苗蛮”、“有苗”，为特定的一支，与后来兴起的苗瑶族群有直接关系。丹朱的罪名《史记》中有记，显得有点滑稽：“毋若丹朱傲，维漫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绝其世。”颇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意思。“朋淫于家”乃生活作风问题，在那个时代值不得大惊小怪。而丹朱的“毋水行舟”是个什么举动呢？这是风俗问题，说穿了就是“船棺”葬俗。被打散了的“苗蛮”四处逃窜，向东进了武夷山区，故有了武夷山崇安附近的岩洞葬式的船棺。向西则进入四川盆地，故有了平原地区的船棺。这一支进入蜀地的饕餮后人又被称为“彭人”和“夔人”。向南则有了越南乃至更远地方的船棺习俗。晚些时候这一葬俗演变为常见于桂、滇一带的岩洞葬和悬棺葬。船棺（或岩洞葬、悬棺）的葬俗分布较为分散，且并非分布地区的葬俗主流，这一现象亦反映出被打散的“苗蛮”四散的结果。当然，晚些时候多集中于今滇、桂、黔、湘等省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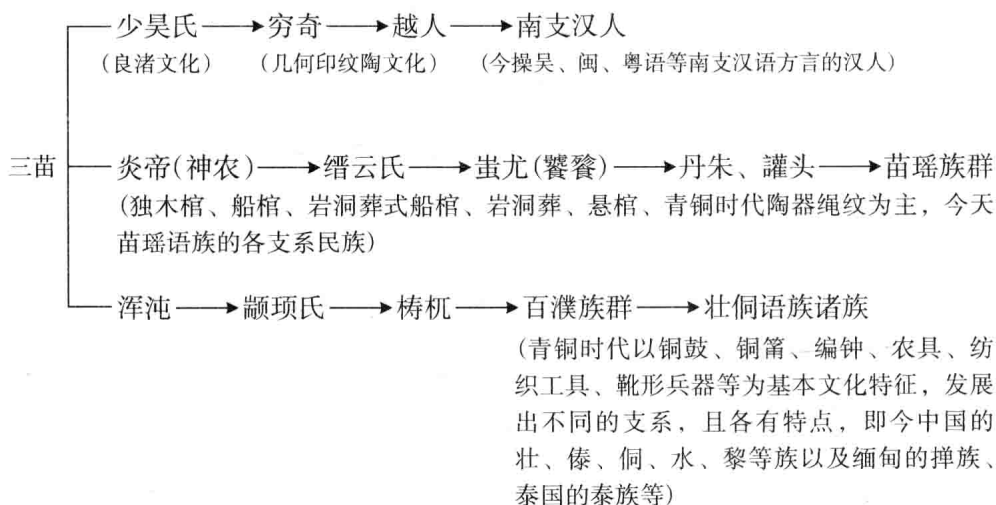
史传黄帝的后裔浑沌和枵机，笔者推断与后来形成的“百濮”民族系统有关。《史记》对枵机有“尾长一丈八尺”的记录，此与濮之有尾相合。枵

① 袁珂编著：《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丹朱》，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89页。



杙疑为少数民族发音的汉译字，而浑沌则为汉意词。泰国的泰族最敬仰和崇拜的古代君王称为陶宏、陶真（亦汉译音字），杙、陶同音。“陶”及“布”的发音在壮傣语中的意思一样，同为尊称“老者”和“祖父”的惯用语。“杙杙”之音与“陶宏”之音接近。傣族发音更近似于“瓮”，而非“宏”。当然，因为所在地区不同，发音会略有出入。浑沌乃太阳神的象征，归纳起来，浑沌之形象：（1）状如黄色球囊；（2）红如丹火；（3）有翼无足；（4）混沌无面目；（5）是识歌舞。这与西南地区后来的一种独特用具——铜鼓，似有某种渊源。铜鼓鼓面上的芒纹，是太阳崇拜（或宇宙观）的体现，围绕芒纹一般有翔鹭（有翼无足），鼓圆桶形，并与歌舞祭祀有关。

据上文的分析，笔者提出广义的“三苗”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上古时代长江中游至长江下游的三大民族。即少昊氏之裔子穷奇，其考古学文化以良渚文化为代表，后来融合发展成为越文化。少昊氏是南支汉人的祖先，而良渚文化（即后代越文化）早期与大汶口文化有着某种关系，大汶口文化部族或为北支汉人的祖先（？）。缙云氏为炎帝（神农）系统，其不才子饕餮实为蚩尤，为后来的苗瑶族群的先人。而浑沌或杙杙之部落，与后来形成的百濮族群有关，这一族群发展为今天壮侗语族的壮、傣、侗等民族。见下图：



图一 “三苗”及后代民族的分布和走向